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苏守波 孙珺艳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重要论述,既明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又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关联。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就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时代内涵,大力增强文化自信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厚重的历史文化根基和现实发展动力。

文化建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支撑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既是坚定“四个自信”的价值遵循,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层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到重大历史关头,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为亿万人民、为伟大祖国鼓与呼。”回溯历史,文化建设始终是推动民族发展的根基,助力中华民族向着现代化征程阔步迈进。我们要在梳理历史脉络中明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由危亡转向复兴的关键作用,在奋进新征程中把握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文化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深厚价值,在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理解文化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积极加强文化建设,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和精神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二十大对文化建设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就如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出了一系列战略性规划,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认识,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文化建设始终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基础性工程,我们必须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定“四个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要紧紧围绕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重要任务,推动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为主动、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建设,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战略谋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人文精神和文化理念,如仁爱、诚信、和谐、孝敬、礼让等,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道德基础,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为治国理政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智慧和实践策略,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理念、理论、目标、制度等更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意蕴,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活水源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在中华儿女中有着天然的亲和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见利思义、见义勇为”的道德品格,“天下为公、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舍生取义、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处世方法,“信守承诺、俭约自守”的个人品质等,是中华民族坚定自信的力量源泉和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为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深厚的精神滋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精神保障。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本与源、根与魂。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是对人类社会现代化道路的全新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大同世界、民胞物与、万国咸宁、天下和合”等理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智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世界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们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提炼其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推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构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开辟人类社会现代化发展和文明进步的美好前景。

加快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使命担当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科学社会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本质、最重要的东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实质所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智慧成果,其蕴含的民本思想、道德观念、人文精神、哲学智慧等,同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契合。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运用其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精神内核有机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中,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根基。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关键在于使其实现生活化的创新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就是因为其有机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实现了文化与社会的深度融合,成为人们的心理自觉和行动自觉。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进程中,有效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作用,就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阐释,既要通过创造性转化使之呈现富有时代气息的价值内涵和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又要通过创新性发展使之拓宽内涵与外延,增强其感召力,唤醒人们“日用而不觉”的文化情怀,进一步擦亮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文化底色。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和思想来源,具有跨越时空的永恒魅力。我们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断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价值凝聚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加丰富的精神文化滋养,筑牢其思想根基,进而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苏守波,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孙珺艳,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21BKS116)阶段性研究成果)]

构建城区经营性停车场治理新格局

□高鹏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完善城区经营性停车场的治理方式已成为影响城市高质量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的重要课题。当前,停车资源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单纯依靠增加停车位供给的传统思路已难以满足现实需求,必须优化治理理念,落实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顶层设计。这需要我们进一步转变工作思路,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丰富城区“停车难”问题的解决思路,以此提升停车资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务治理水平,有效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新华社

创新系统治理 数据驱动提升应用效能

系统治理的关键,就是打破传统碎片化管理模式,将经营性停车场管理置于城市整体运行考量,通过数据要素应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看,数据要素已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关键要素;将数据驱动的理念深度融入经营性停车场治理实践,是破解停车难问题的创新路径。具体而言,要注重推进智慧停车平台建设,探索建设具备数据汇聚、智能调度、协同管理与公共服务等多重功能的服务平台,整合各类停车场资源信息,实现停车资源可视化、可调度、可管理,为及时缓解“停车难”问题和经营性停车场规划提供支撑。要注重推动全链条数据的共享应用,探索通过部署物联网设备、智能感应装置等设施,实时采集车位使用状态、车辆流动情况等基础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预测停车需求、优化资源配置。要注重深化数据的创新应用,在实现智慧停车平台基本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探索拓展以单位停车场夜间有序对外开放、经营性停车场与周边住宅区错时共享等为方向的数据创新应用模式,最大限度提升存量停车资源利用周转率。

健全依法治理 建章立制保障秩序规范

法治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规范停车场管理的根本保障。从目前的情况看,部分经营性停车场暴露出的权责不清、监管缺位、价格混乱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制度供给和执行存在缺位及错位。因此,建立健全保障停车场规范运营的制度体系,明确各方权责边界,规范市场秩序,是实现长效治理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要注重完善停车场管理法规体系。以烟台市为例,可在《烟台市停车管理规定》已明确规划建设、使用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的基础上,探索完善与《条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服务标准和收费办法,形成层次分明、相互衔接的制度体系。要注重权责界定,经营性停车场管理涉及多个部门,必须通过制度形式明确主管部门和协同部门的职责分工,建立有效的协作机制。要注重依法规范市场秩序,对政府投资建设停车场、路内停车泊位以及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特征的停车场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管理,对其他停车场实行市场调节价。同时,加强监管,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以此为经营性停车场治理提供稳定的制度预期,保障各方合法权益。

推进综合治理 多元协同监管运营服务

综合治理强调的是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治理手段的多样性,要求超越传统的单一管理模式,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经营性停车场管理涉及多方利益,要调动政府、市场、社会等力量共同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的良性互动机制。具体而言,要注重构建多元共治格局,加快政府从直接提供者到规则制定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转变;探索形成多元治理合作运营模式,鼓励专业组织参与停车场运营管理,提升服务专业化水平;同时发挥社区、业委会等基层力量作用,引导居民参与停车场管理协商,形成治理合力。要注重创新监管服务方式,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效,继续用好“双随机、一公开”模式,在经营性停车场备案、日常管理等方面有效监管。要注重健全信用监管体系,在信用信息共享、部门协同机制完善之时,探索建立停车场经营者和车主信用档案,对信用良好的经营者和车主给予便利措施,对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条件成熟后可将恶意逃费、违规停车等行为一并纳入征信系统,形成有效约束,让信用监管真正发挥作用。

强化源头治理 科学部署优化资源配置

源头治理要求将经营性停车场规划建设纳入城市发展的整体布局,从供需两端系统谋划,实现停车设施与城市发展相协调。有效解决“停车难”问题必须坚持从源头入手,通过科学规划优化停车资源配置,避免先乱后治,实现停车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具体而言,要注重发挥交通运输专项规划的引领作用,将停车场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与城市建设、交通发展有效衔接。要注重实施差别化供给策略。根据不同区域功能定位和公共交通发展水平,制定差异化的停车供给政策。如在中心城区等公共交通发达区域严格控制停车位供给,通过价格杠杆等方式引导绿色出行;在城市外围区域和交通枢纽适度提高配建标准,方便市民换乘公共交通。探索建立优先满足基本停车需求、合理规划出行停车需求的长效机制。要注重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评估规划实施效果,根据城市发展实际和停车需求变化,及时优化调整规划内容。在旅游旺季客流量大的景区经营性停车场,探索建立停车场数据统计监测制度,全面掌握停车资源供需情况和流向,为规划调整提供依据。从供需两端优化停车资源配置,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避免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构建城区经营性停车场治理新格局是一项关系到民生福祉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措并举、久久为功。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提升群众出行体验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的工作要求,形成四维一体的治理体系。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强化科技支撑,推进停车设施与城市更新、公共交通等进一步融合,切实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作者单位:中共烟台市牟平区委党校)

烟轩细雨 YAN XUAN XI YU

理论前沿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浅析

□王艺玮 牟小龙

2013年,我国开启共建“一带一路”的伟大历程。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从“大写意”进入“工笔画”,从硬联通扩展到软联通。教育对外开放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环节。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将“通过鲁班工坊等推进中外职业教育合作”作为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八项行动内容之一,职业教育被赋予重要使命。

总体情况

目前,全球共有156个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其中非洲52个、亚洲41个、欧洲27个、美洲24个、大洋洲12个。全国27个省(区、市)的300多所职业院校已在80多个国家(地区)设立了“鲁班工坊”“中文工坊”“班墨学院”“丝路学院”等500多个办学机构和项目。职业院校通过设立境外办学机构项目、开展境外师资培训、输出职业教育标准、组建职业教育国际联盟、开展职业技能国际赛事等举措,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及其中资企业培养大批本土技术技能人才,有力推动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职教出海”已经成为教育出海的生力军,成为职业院校发力的新方向。政策层面,2013年以来,国务院、教育部等陆续出台政策:2014年首提职业院校境外办学,2015年要求高职配合产能“走出去”,2016年鼓励职教随行业企业出海,2019年“双高”计划要求建鲁班工坊。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指出,鼓励职业教育领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鼓励有条件的职业教育机构赴境外办学。2024年明确以东盟、中亚为先行区打造职教品牌。实践层面,职教“出海”实现三重跃升:“借船出海”从短期培训升级到学历教育;“随船出海”从单点突破到组建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联盟等机制,输出经本土化修订的职业标准,搭建对非合作平台并创建“会—盟—奖—赛—展”体系;“造船出海”从2016年泰国首所鲁班工坊,发展到亚欧非30余个,各地涌现丝路学院、班墨学院等品牌。成效上,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中资企业通过海外建厂、并购、投资等方式加速全球布局,已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参与者。职业教育坚持“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理念,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帮助海外中资企业降本增效,提升本土员工的就业质量。这种“伴随式”服务模式既支撑了国际产能合作,又培养了符合全球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人才,显著增强了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引领力。

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带一路”国家实际办学条件和环境差异巨大。部分国家重经济轻教育合作,沿线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86年。除中东欧国家外的其他国家均比较低,西亚、东南亚、南亚分别为8.3年、7.1年和5.6年。职教基础薄弱,导致出现师资培养难、设施陈旧、语言文化存在壁垒等问题。本土化适配与机制建设不足,我国职教大规模“走出去”的时间短,多为学校自主行为。除鲁班工坊外,其他项目还面临法规、资源、需求分析、风险研判等短板。国家和地方政策、经费支持不足,缺乏全国统筹及统一标准,输出标准不规范,教学装备投资存在“国有资产管理”问题。区域合作“冷热不均”,服务的国家集中在亚非,与美洲、大洋洲欠发达国家的合作少。国内资源缺乏协调,亚洲电气自动化等专业扎堆办学,泰国、巴基斯坦出现“橡皮图章”式项目。品牌建设分散,国家层面有鲁班工坊,省级有郑和学院、班墨学院等,院校层面有乡村振兴学院等,品牌功能趋同,鲁班工坊仅覆盖30个国家,巴基斯坦多品牌扎堆重复办学。政行企校协同弱,常态化交流少、渠道不畅,“校热企冷”普遍。海外人才培养质量监控无统一标准,出海标准与当地产业、教育体系适配不足,部分项目“轻技能、重证书”。院校与师资不均衡,东部沿海、边疆省份项目多,内陆省份少,教师外派比例低,“双师型”人才匮乏,海外培训缺乏相关标准。

职教出海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思路

近年来,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经历了从主动交流、引入合作,随企出海、布局海外,到形成品牌、百花齐放的发展过程。下一步,应进一步优化布局和资源配置,提升办学质量和影响力,突出合作平台和机制作用,做实出海项目、做响出海品牌,持续深化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能力。需要提高站位、优化布局,将职教融入外交体系,统筹援外资源,发挥“鲁班工坊”标准化装备和本土化培养的作用,完善装备出口认证与人员流动机制;秉持“深耕亚洲、做强非洲、夯实欧洲、开辟拉美、突破大洋”方针,以亚非为先行区建立合作格局;对接企业“走出去”,构建技能培训和学历提升体系,培养精通技能与中文的本土人才。加强顶层规划,制定境外办学规范,避免扎堆建设,健全管理与质量保障机制;建立全国统筹机制,强化省级政策配套,优化区域协作,发挥边疆省份地缘优势;规范标准输出,接轨国际标准,建立标准共享平台。统一品牌与提质,以鲁班工坊为国家级品牌、班·墨学院等为省级品牌,清理不合规项目;在成熟区域建设海外应用技术院校,遵循“稳妥办学”方针;构建政校企协同机制,开展优质项目评先,实施“二大计划、三大行动”拓展合作区域。提升质量,建立“五位一体”质量保障体系,培养复合型人才,改革培养模式;调研企业需求,优化专业、开发双轨课程,采用分段培养模式,建立“招生—培养—就业”跟踪体系。夯实基础,院校将国际化融入规划,开展评估、组建团队、加大投入;打造师资队伍;强化项目运营。搭建平台,组建全国职教出海联盟与区域联合体,建立质量保障体系;推进“会、盟、奖、赛、展、刊”六大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提供全球职教治理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烟台职业学院)